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商代史·卷三

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

THE ORIGIN OF SHANG TRIBE AND SOCIAL
CHANGES IN PRE-SHANG PERIOD

一 宋镇豪 主编
王震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商代史·卷三

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

THE ORIGIN OF SHANG TRIBE AND SOCIAL
CHANGES IN PRE-SHANG PERIOD

宋镇豪 主编 王震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王震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1

(商代史·卷三)

ISBN 978-7-5004-8927-6

I. ①商… II. ①王… III. ①商文化(考古学)—研究
IV. ①K87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7327 号

责任编辑 黄燕生
特邀编辑 张 翀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孙元明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9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商族的起源	(7)
第一节 商族的发祥：“契封商”与“契居蕃”	(7)
第二节 帝喾并非商之始祖	(12)
第三节 有娥氏、高辛氏与商族缘起	(17)
第二章 商族的早期迁徙	(26)
第一节 昭明居砥与迁商	(26)
第二节 相土居“商丘”	(30)
第三节 王亥迁殷与上甲微居邲	(32)
第四节 河伯和有易氏的居地及其与商之关系	(33)
第五节 八迁的范围不出冀南与豫北地区	(37)
第三章 商汤灭夏前的亳邑	(40)
第一节 汤居亳诸说之辨析	(40)
第二节 甲骨文亳邑与郛亳	(61)
第四章 先商的文化与年代	(100)
第一节 关于先商文化的探讨	(100)
第二节 先商文化与商先公先王的时段对应关系	(122)
第五章 先商社会形态的演进	(148)
第一节 商契至王亥时期的中心聚落形态	(148)

第二节 上甲微至成汤时期的邦国形态	(164)
-------------------------	-------

第三节 成汤时期由邦国向王国的转变	(172)
-------------------------	-------

后 记	(181)
-----------	-------

彩图目录

- 彩图 1 甲骨文中的高祖癸(采自《殷契粹编》)
- 彩图 2 甲骨文中的王亥(采自《甲骨文合集》)
- 彩图 3 河北磁县界段营遗址先商文化陶鬲(采自《考古》1974 年第 6 期)
- 彩图 4 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先商陶鬲—1(采自《考古学报》1979 年第 2 期)
- 彩图 5 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先商陶鬲—2(采自《考古学报》1979 年第 2 期)
- 彩图 6 河北邢台葛家庄出土先商文化陶器(采自《三代文明研究》)
- 彩图 7 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先商文化陶鬲(采自《豫东杞县发掘报告》)
- 彩图 8 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先商文化器物(采自《豫东杞县发掘报告》)
- 彩图 9 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先商文化大口尊(采自《豫东杞县发掘报告》)
- 彩图 10 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丛葬坑(H18)(采自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 彩图 11 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有刀割痕的人头骨(采自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 彩图 12 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大汶口文化刻符陶尊(采自《文物中国史·史前时代》)

插图目录

图 1—1	甲骨文中的“夔”及“高祖夔”(采自《殷契粹编》)	(14)
图 2—1	先商迁徙与商代迁都示意图	(39)
图 3—1	甲骨文“商”与“亳”之关系(采自《甲骨文合集》)	(62)
图 3—2	甲骨文“丘商”、“兹商”等卜辞(采自《甲骨文合集》)	(70)
图 3—3	《小臣艳犀尊》铭文(采自《殷周金文集成》)	(74)
图 3—4	卜辞与《禹贡》“大河示意图”(采自刘起钎《古史续辨》)	(92)
图 4—1	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一期第 1 段陶器(采自《考古》2000 年第 7 期)	(102)
图 4—2	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一期第 1 段遗物(采自《考古》2000 年第 7 期)	(103)
图 4—3	郑州南关外中、下层出土陶器(采自《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105)
图 4—4	郑州化工三厂 H1 出土岳石—漳河型混合文化陶器 (采自宋豫秦《论杞县与郑州新发现的先商文化》)	(110)
图 4—5	下七垣文化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 (采自《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116)
图 4—6	下七垣文化鹿台岗类型(采自《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117)
图 4—7	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采自《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119)
图 4—8	邢台葛家庄早段陶器(采自《三代文明研究(一)》)	(120)
图 4—9	邢台葛家庄晚段陶器(采自《三代文明研究(一)》)	(121)
图 4—10	新砦期陶器(采自《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126)
图 4—11	下七垣文化陶器分期图(之一)(采自《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137)
图 4—12	下七垣文化陶器分期图(之二)(采自《中国考古学·	

夏商卷》)	(138)
图 4—13 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与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陶器 比较图(采自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142)
图 5—1 甲骨文中从“隹”和从“鸟”的王亥(采自《甲骨文》)	(163)
图 5—2 含有“上甲六示”直系先王祭祀卜辞(采自《甲骨文合集》).....	(167)
图 5—3 “自上甲至于多后”合祭卜辞(采自《甲骨文合集》).....	(167)
图 5—4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亳”字(采自高明《古文字类编》).....	(173)

绪 论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每一古老的文明民族都有自己的史前史，都是用神话传说和英雄般的史诗来描述本族的起源、迁徙、社会变迁，商族的文明序幕也正是这样拉开的。

作为商族文明的序幕，本卷所论述的商族起源、早期迁徙、先商文化以及灭夏之前商族社会形态的演变，这不仅是商族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从五帝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或一个重要侧面。

本卷秉承这样的架构旨趣，既深感其重要，又觉得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课题。之所以这样说，这是因为本卷所涉及的商族的起源、先商时期的迁徙、考古学上先商文化的探索、先商社会形态的变迁等内容，由于它们每一个都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难题，所以，这里既需要对前人的研究认真地加以梳理、评判和取舍，又要作出属于自己的新研究，其难度应该说是很大的。

虽说难度很大，许多问题一时难以定论，是这一研究领域目前的现状，但也并非不能将问题引向深入、向前推进、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某些共识，最后趋于问题的解决。在这里，笔者以为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和应遵循的途径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方法和途径就是将历史文献与甲骨文、考古学以及人类学这四者的结合，但在做这四个方面的结合时，就文献、甲骨文与考古学的结合而言，它要求需对考古和文献本身都有一个梳理，是在系统梳理、系统考虑、系统研究基础上的结合，而不是“贴标签”式的结合和牵强比附；就人类学理论而言，它要求既对国外人类学的理论及其成果进行吸收和借鉴，但又不能停留在简单套用的路数上，而应结合文献和考古学所提供的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上的创新。

学术贵在创新。说到先商史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以往的著述对此是或略的。然而，我们对先商社会形态演进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商族文明起源的

研究,作为文明起源的研究,它既是一个由考古和文献所提供的实证问题亦即考古学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在理论方面,以往倚重的是19世纪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理论,诸如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说、“血婚制—伙婚制—对偶婚制—一夫一妻制”说、“部落联盟”与“军事民主制”说,等等;也受到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的一夫一妻制和土地私有制是文明社会的两大特征这些观点的影响,近十几年来也有学者热衷于套用塞维斯的酋邦理论。其实,酋邦理论本身也在发展变化,就连酋邦的定义、概念,奥博格(K. Oberg)、塞维斯(M. D. Sahlins)、弗兰纳利(K. V. Flannery)、斯图尔特(J. Steward)、皮布尔斯(C. S. Peebles)、卡内罗(R. L. Carneiro)、厄尔(T. K. Earle)、克利斯蒂安森(K. Kristiansen)等学者之间就有差别,酋邦理论之外,与塞维斯齐名并属于同一时代的还有弗里德(Morton H. Fried)的社会分层学说。从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复杂化的进程的视角来说,弗里德的社会分层理论更容易与考古学相结合,而且这一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分为阶级和阶层的学说十分接近,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学术界并不陌生。此外,关于国家产生的途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提出古希腊人、罗马人和后来的日耳曼人所建立的国家,代表了三种不同的途径和模式,这在我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我们以往的研究每每是把恩格斯对古希腊、罗马的论断照搬到中国古代社会上来,岂不知中国古代是不同于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因而我们应学习恩格斯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研究和发现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途径。

摩尔根和塞维斯、弗里德等人的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巨大的贡献,但也有其局限性,针对这些理论的局限性,笔者于1994年初版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提出了文明起源的聚落形态演进三阶段说,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文明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①,其后在此基础上,笔者又提出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作为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的“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说”^②,本

① 杨升南、马季凡:《1997年的先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5期。

② 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王震中:《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7期(2004年1月),后收入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卷《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在论述先商社会形态的演进时，就是应用“文明起源的聚落形态演进三阶段”说和“国家形态演进的邦国—王国—帝国三阶段”说的理论观点进行的新的探索，只是由于有关先商的考古资料中属于聚落形态的资料并不那么充分，因而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

在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关于商族的发祥、起源和先商时期的八次迁徙问题，面对已有的诸说，本书的切入点，一是认为“契封于商”之商与“契居蕃”之蕃，是一地两名，而“蕃”为战国时的番吾，在今河北省磁县境，这样，最早的“商”与“蕃”即可与此地的古漳河实即“商河”相联系。二是提出帝喾并非商之始祖，商的始祖及商族的形成始自契，契之前的有娥氏简狄，只是商族形成之前的母方支系，它属于构成商族的来源之一，而帝喾则属于商族的上帝之神被人格化、伦理化的结果，因而，以往研究中所依据那些或与帝喾有关或与简狄有关的材料，也就需要重新进行分析。

在先商时期的八次迁徙问题上，本书是对孔颖达、梁玉绳、王国维、丁山、岑仲勉以来研究的得失进行梳理、取舍和补充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其结论是：以商契为标志的商族发祥于冀南的古漳水流域，商契之后，昭明所迁之砥石是在古泚水、石济水所径流的今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一带；相土所居之商丘在今河南濮阳；商侯冥时期商族活动的中心在豫北冀南的古黄河中游；王亥居于安阳之殷；上甲微居于邺。关于汤居亳，鉴于问题的重大，书中特列一章作了专门的探讨。

书中通过对甲骨文亳邑的重新研究，并结合《吕氏春秋·具备》等篇中有关“鄩薄（亳）”的记载，提出了甲骨文中的亳即内黄鄩亳说。其思路是：通过对甲骨文中的“商”、“中商”、“大邑商”的系统分析，提出此“商”虽然有广义上可指“商国”，狭义上指“商都”等不同层面的含义，但它们都是以晚商时期的商都为依托，因而在征人方卜辞中距离“商”地很近的“亳”，就在殷都安阳之东、紧邻殷都的地方，亦即《吕氏春秋》中的鄩亳（鄩亳即殷亳，从大范围的殷地来看，它可以说是殷地之亳或靠近殷地之亳；若在殷地内进一步区分出鄩地，则可以说是鄩地之亳或靠近鄩地之亳），其位置在内黄或内黄附近，特别是内黄靠近濮阳的地方，此即成汤灭夏之前所居之亳，也是甲骨文中唯一的亳。灭夏以后，商王虽先后建都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但在甲骨文时代即在商代晚期，商人自己并不称其为亳，甲骨文

中也无后世所说的“三亳”并存的情形。

本书的第四章，探讨的是考古学上先商的文化与年代。书中论证了漳河型下七垣文化是以商族为主体所创造的商先公王亥以后的先商文化，并推论河北涧沟型龙山晚期的文化遗存有可能是商契时期即商族发祥期的先商文化，昭明、相土至王亥的年代应与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年代相当，但这一时期的先商文化目前尚未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四章中，为了论述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究竟与先商时期的哪些商先公相关联、相对应，特意用了一节的篇幅来论述与先商并存的夏的纪年和夏文化的分期。在论述中，充分考虑了2005年以来最新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但又指出在使用最新测年数据进行系列数据拟合年代中^①，“新砦、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合”结果，不如“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合”结果更可靠，其理由是这两次的测年数据的拟合虽然都是所谓“系列数据共同进行数据的曲线拟合”，但二者是有差异的，在“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合”中，其不足是没有二里头第一期之前的数据即没有被二里头第一期地层所叠压的文化层的数据，所以二里头第一期测年数据在计算机的自动拟合中被压缩的幅度可能有限；在“新砦、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合”中，虽然有二里头第一期之前的测年数据，但这些数据不是二里头遗址的数据，它们与二里头遗址的那些数据根本没有地层上的叠压关系，所以其拟合的可信性也还是有疑问的。我们知道，被拟合的系列数据之间，最理想的条件是所采集的标本属于同一遗址内具有上下地层叠压关系的测年标本，只有这样的标本，其系列数据之间才具有确实无疑的前后年代关系，用这种具有确实无疑的前后年代关系的系列数据来压缩拟合，其拟合的结果才会较为可靠。然而，在“新砦、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合”中，新砦期的数据与二里头一期的数据是两个不同的遗址的数据，二者之间只是根据它们之间文化分期之间的年代关系，而并非依据同一遗址内的直接地层关系，所以其拟合的条件不是最理想的，何况在有的学者看来，新砦期尤其是新砦期晚段与二里头一期在年代上具有重叠交叉的关系，这样用新砦期晚段的数据来向后压缩拟合二里头一期的测年数据，其结果当然会使二里头一期的拟合日历后的年代偏晚。不仅

^① 张雪莲、仇士华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岗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第82页，表十“二里头第一至五期拟合结果”，表八“新砦、二里头第一至五期拟合结果”。

二里头一期是这样，二里头二期和三期被拟合压缩的年代，也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所以有关二里头遗址的系列样品测年数据拟合的两次结果，笔者有理由更相信“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合数据”。本卷也是以“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合数据”为依据，并结合最新的有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将夏代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中原龙山晚期为早期夏文化，新砦期和二里头一期为中期夏文化，二里头二期和二里头三期为晚期夏文化。早期夏文化大体是大禹、夏启、太康、中康、帝相（包括后羿和寒浞）时期的文化，时间约有 131 年的范围，即公元前 2024—前 1893 年（或者公元前 2043—前 1912 年）；中期夏文化大体上是少康、帝予（杼）、帝槐（芬）、帝芒、帝泄时期的文化，时间约有 150 年的范围，即公元前 1893—前 1743 年（或者公元前 1912—前 1762 年）；晚期夏文化大体上是帝不降、帝扃、帝廑、孔甲、帝皋、帝发、履癸（夏桀）时期的文化，时间约有 190 年的范围，即公元前 1743—前 1553 年（或者公元前 1762—前 1572 年）。由于作为先商文化的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一、二、三期是与二里头文化的第二、三期及第四期初段的时间相当，下七垣文化第一期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相当，时间约在夏代晚期的前段，具体来说约为夏王帝不降时期，而与帝不降同时的商先公，据《竹书纪年》是王亥，因而，漳河型下七垣文化是商先公王亥以来的先商文化。

在以上有关商族的起源、先商时期的迁徙、先商的文化及其年代的论述的基础上，作为本书的第五章，论述了先商时期商族社会形态的变迁，提出商族进入初始国家的状态并非始于商汤灭夏，而是始自商先公上甲微时期；上甲微以上至商契时期，其社会性质也并非仅为所谓父系氏族社会，而至少属于“中心聚落形态”阶段，亦即弗里德所谓的“阶等至分层社会”阶段或塞维斯所谓“酋邦”阶段，甚至也有可能已进入邦国阶段，当然这要等到龙山晚期和新砦时期的先商聚落考古有新的发现，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目前有关先商文化的聚落考古学的现状而论，笔者主要是以文献记载为主，以考古为辅，提出从商契至成汤，商族社会形态的演进，经历了由中心聚落形态走向邦国（初始国家也即早期国家）形态、再走向王国（王朝之国）形态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其中，王亥、王恒时期是中心聚落形态向邦国的过渡时期。甲骨文中在王亥之亥字上，冠以鸟形的写法，主要是表明作为第一位被称为“王”的王亥，是一位具有玄鸟神性之王，说明此时“王”的观念主要表现的是其宗教性，属于王之雏形。成汤也正是通过战争征伐和宗

教祭祀这两个重要的机制，使雏形或萌芽状态的王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伴随着对夏王朝的推翻和取而代之，实现了由邦国向王国的转变。至于进入商代以后，商作为王朝国家，其结构和形态是由王国（即王邦，亦即“内服”之地或所谓“王畿”之地）和众多附属邦国（分布于四土即“外服”之地的侯伯等国族）组成的“复合型国家结构”，对此笔者将在《商代都邑》卷中有所论述。

第一章

商族的起源

中国上古史上的商族发祥于何地？其最初活动的地域在哪里？这是叙述商的早期历史时应该回答的话题，但也是异说纷呈、莫衷一是的问题。最初的研究主要是从文献的角度着眼的多，后来随着田野考古收获的不断增多，愈来愈多的学者都试图将这一研究与考古学上的先商文化结合起来。尽管如此，也还是见仁见智的局面。究其原因，或可能是对文献理解上的差异，或可能是考古学与文献结合的方法尚值得推敲。较为科学的结合应该是在对二者分别有一个系统研究、系统梳理基础上的结合。为此，本章首先从文献的角度对于商族的起源与商汤灭夏以前的迁徙作一系统梳理，然后再求得与考古学文化的结合。

第一节 商族的发祥：“契封商”与“契居蕃”

商族原有悠久的历史，建立过强大的商王朝，被周推翻后尚保留有宋国一直到战国晚期，因而有关商族的起源及其早期的迁徙也留有一些文献资料。然而从实证史学的角度看，这些史料作为可以征信的史实，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由此，有关商族的起源也是异说迭起，诸说纷呈。大致有：1. 西方说，认为商族发祥于陕西商洛^①或关中地区^②；2. 东方说，认为

① 《书·汤誓》郑玄注：“契始封商，遂以商为天下之号。商国在太华之阳。”又《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商尝之子虞所封也。”

② 顾颉刚：《殷人自西徂东说》，《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顾颉刚先生晚年则认为商族发祥于我国的东部地区，见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周公东征史实考证四之七》，载《古史考》第六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商族发祥于河南商丘^①、或云发祥于山东^②；3. 晋南说，认为商族发祥于山西永济^③、或云发祥于垣曲、永济一带^④；4. 河北说，认为商族发祥于河北漳水^⑤、河北易水^⑥、河北永定河与滹水之间^⑦；5. 河北东北^⑧及环渤海湾一带说^⑨；6. 北京说^⑩；7. 东北说，认为商族发祥于辽宁西部^⑪、或云发祥于幽燕。^⑫那么，商人后裔——春秋时期的商人即宋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诗·商颂·玄鸟》说：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① 王国维：《说商》，《观堂集林》卷一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张光直：《商名试释》，《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③ 李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李民：《关于商族地起源》，《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李民：《豫北是商族早期活动的历史舞台》，《殷都学刊》1984年第2期。

④ 陈昌远：《商族起源地望发微——兼论山西垣曲商城发现的意义》，《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陈昌远、陈隆文：《论先商文化渊源及其殷先公迁徙之历史地理考察》（上）（下），《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2期。

⑤ 田昌五：《试论夏文化》，《文物》1981年第5期；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论文集》（第二版），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02页。

⑥ 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⑦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新1版，第17页。

⑧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下册，1934年版；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版，第24、124页。

⑨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1期。

⑩ 曹定云：《商族渊源考》，《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⑪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东北说》，《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7期；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4页。

⑫ 于志耿等：《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于志耿等：《商先起源于幽燕说的再考察》，《民族研究》1987年第7期；蔺新建：《先商文化探源》，《北方文化》1985年第2期。